

《古今圖書集成》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

金鎬*

【摘要】

現在藏於韓國奎章閣的一部雍正四年（1726）銅活字印本《古今圖書集成》，一向不太為相關研究者所注意。它流傳於朝鮮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朝鮮國王正祖的安排之下在中國購買的。正祖從小好學，為學宗朱子，雖然對清朝的考證學有所批評，卻對清朝文化加以肯定，奎章閣所藏《古今圖書集成》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傳入朝鮮。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是一個較為具體的文化交流過程。加上，據相關文獻的記錄，就可發現《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之後，對當時朝鮮社會發生了較大的影響。可惜的是，目前有關《古今圖書集成》的研究，大部分集中於《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體例、版本和流傳等問題，很少人注意《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的過程和其影響問題。本文首先要探討《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的較為詳細的過程，接著說明它對當時朝鮮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最後，從韓、中圖書交流和西學傳播朝鮮的

* 韓國聖潔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助理教授

角度，試探《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的文化內涵。

關鍵詞：《古今圖書集成》、奎章閣、韓中圖書交流、傳播、影響、文化內涵

一、緒論

眾所周知，《古今圖書集成》（以下簡稱為《集成》）為在清朝康熙年間編纂的大型類書，迄至今日，仍有很大的文獻價值。因為如此，目前為止，關於《集成》的相關研究成果可謂不少。¹不過，鮮有人注意韓國奎章閣所藏的一部《集成》。它是雍正四年（1726）銅活字印本，到了現在，仍保存得非常完整。其實，雍正年間刊印的《集成》起碼有六十餘部，²而隨著時間的經過，現存的完整銅活字印本並不多。³由此可見，現奎章閣所藏《集成》的文獻價值之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集成》流傳於朝鮮，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朝鮮國王正祖的安排之下購買的。正祖從小好學，為學宗朱子，雖然對清朝的考證學有所批評⁴，卻對清朝文化加以肯定，《集成》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傳入朝鮮。從這個角度來看，《集成》傳入朝鮮是一個較為具體的

¹ 這方面的論述可參看，詹惠媛，〈《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回顧（1911-2006）〉，《漢學研究通訊》27卷3期（2008.8），頁16-29。

²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141。

³ 到底幾部完整的銅活字印本存世，各家的說法並不一致，需要全盤的調查。裴芹主張，完整或已殘缺而存世的《集成》計有24部，《古今圖書集成研究》，頁154。另外，沈津則主張「今《集成》全帙不多，國內僅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徐州市圖書館四部。上海圖書館（缺十二冊）、遼寧省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寧波天一閣所藏均為殘帙。臺灣「中央圖書館」一部、臺灣「故宮博物院」三帙。此外哈佛、普大以及英國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各一部。聞諸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及西德柏林圖書館各一部。如此，大約共存全本十三部。」《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305。需要指出的是，裴、沈二人均未提及現在韓國奎章閣所藏一部雍正銅活字印本《集成》全帙的存在。

⁴ 如正祖云：「名物之家，訓詁之流，紛然弊精於識小之工。以至近世考證之學，其小愈甚，而其去格致也愈遠。然則真正格致，當於誠正上用力。」〈經史講義四十四·總經二〉，《弘齋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65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卷百七，頁173。

文化交流過程。加上，據相關文獻的記錄，就可發現《集成》傳入朝鮮之後，對當時朝鮮社會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可惜的是，目前為止，有關《集成》的研究，大部分集中於《集成》的編纂、體例、版本和流傳等問題，很少人注意《集成》傳入朝鮮的過程和其影響問題。如早期，日本學者藤塚鄰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中指出《集成》傳入朝鮮的過程之外⁵，在韓國發表幾篇有關《集成》的文章：有的論者利用中國正史和《集成》裡有關烈女之記錄，把它當作說明朝鮮社會如何強調女性貞節時的對比資料⁶；有的論者對於奎章閣所藏《集成》做了很簡單的介紹⁷；有的論者提及丁若鏞利用《集成》而製造出起重架的事實⁸；有的學者指出朝鮮利用收錄於《集成》的中國地圖來製作各種地圖的歷史事實⁹。但是，上述的研究成果，幾乎篇幅有限，其論述往往點到為止，因而無法深入地探討《集成》傳入朝鮮的過程及其影響問題。

本文基於上述的研究現況，首先要探討《集成》傳入朝鮮的較為詳細的過程，接著說明它對當時朝鮮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最後，從韓、中圖書交流和西學傳播朝鮮的角度，試探《集成》傳入朝鮮的文化內涵。

⁵ 藤塚 著、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 研究：嘉慶·道光學壇 李朝 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頁25。

⁶ 李在斗，《〈東國輿地勝覽〉的孝行記錄與孝認識（譯名）》（慶北：慶北大學校史學科碩士論文，2005），頁47-48。

⁷ Yim, Ji-young, 《朝鮮正祖朝購入中國本の書誌學之研究（譯名）》（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文獻情報學科碩士論文，2008），頁44。需要注意的是，這篇論文指出正祖把收錄於《集成》的《奇器圖說》給丁若鏞，使得丁若鏞能夠研究「引重器重之法」，以此便於華城之築。

⁸ 陳冰冰，《從〈熱河日記〉看18世紀中國文化的樣相（譯名）》（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國語國文學科博士論文，2008），頁150-151。

⁹ 裴祐晟，《朝鮮後期國土觀與天下觀的變化（譯名）》（首爾：一志社，1998），頁246-255。

二、《集成》傳入朝鮮之始末與朝鮮學界的認識

(一) 《集成》傳入朝鮮之始末

《集成》傳入朝鮮與朝鮮第22代君王正祖（1752-1800）有直接的關係。正祖被稱為一位開啟18世紀朝鮮王朝文藝復興的君王，他即位之際，表明「繼志述事」和「崇儒重道」的立身原則，一方面試圖強化君權，一方面施行諸多「文治」政策¹⁰。正祖可說是一位學者君王，一生勤於讀書，著作非常豐富，如他的文集《弘齋全書》共184卷。又依據《群書標記》¹¹的記載，正祖親自所編纂的書籍共有89種2,490卷；另外，正祖命臣子編纂的書籍亦有64種1501卷，可謂非常可觀。

正祖在位期間編纂了很多書籍以外，還對於書籍的蒐集頗為關注，主要從朝鮮各地與清朝非常努力地蒐集了各種書籍。實際上，正祖自還沒登基之前，已對於清朝所出版的書籍頗為關心，為了購買中國書籍，曾命編纂《內閣訪書錄》¹²。《集成》亦在正祖積極蒐集書籍的過程中傳入朝鮮的，以下將《集成》傳入朝鮮之始末略述一下。

丙申（1776，乾隆四十一年），正祖使燕行使臣徐浩修（1736-1799）在北京購買《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共5020冊502匣。¹³李德懋（1741-1793）

¹⁰ 正祖《日得錄二·文學二》云：「予之十年右文，一念導俗之苦心，不知何時而可食效也。」《弘齋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67冊，卷百六二，頁169。

¹¹ 《群書標記》是一本目錄，記載正祖年間所編纂的文獻之種類、卷數、編纂者、編纂過程等。在這本目錄中，將正祖親自編纂的叫做「御定書」，將臣子們分擔編纂的叫做「命撰書」。相關內容可參看《群書標記》，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貳，頁905-1286。

¹² 《內閣訪書錄》是依據《直齋書錄解題》和《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而撰寫的。相關內容可參看《內閣訪書錄》，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卷壹，頁447-599。

¹³ 《正祖實錄》亦云：「上雅尚經籍，自在春邸，購求遺編，拓尊賢閣之旁而

云：

今上丙申，命使臣副使徐浩修，以重價購之，改裝潢，貯于皆有窩。庚子春，命檢書臣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徐理修，謄抄部目，各係于冊，將使工書者題之，凡四十日訖抄。後又命尚衣主簿臣曹允亨，題冊名，寫字官題部目。¹⁴

通過上述的引文，我們可知正祖在《集成》傳入朝鮮之後，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首先，《集成》經過一次裝潢之後，藏於當時中國書籍存藏之地「皆有窩」。正祖二年戊戌（1778，乾隆43）3月25日，正祖在誠正閣召見奎章閣提學徐命膺時，說「《圖書集成》亦將裝冊，卿須從速入直為看檢」，¹⁵徐命膺則從此開始重新把《集成》裝冊。

儲之，取孔子繫易之辭，名其堂曰貞贖。及夫御極，規模寢廣。丙申初載，首先購求《圖書集成》五千餘卷于燕肆。」（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1991-1995），第六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庚子條」，頁78。事實上，當時購買《集成》並不是只有徐浩修一人的功勞，似乎柳琴（1741-1788）也助一臂之力，正如柳得恭談及柳琴說：「乾隆中印行《圖書集成》一萬卷，正宗教副价內閣直提學徐浩修購進裨客，莫知書所在慌甚，公因翰林編修侍朝得之。」〈叔父幾何先生墓誌銘〉，《冷齋集》，《韓國文集叢刊》260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卷六，頁108。

¹⁴ 〈圖書集成〉，《盎葉記》四，《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9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卷五十七，頁9。李奎景亦說：「清聖祖康熙中，命諸臣設局，編纂《圖書集成》，因循未成。世宗雍正初年，切責詞臣，董督三年始成，蔣廷錫為總裁。凡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一萬卷。又有目錄四十卷。我正廟丙申，命副使徐浩修，以重價購之。改裝潢，總五千二十冊，五百二套，貯于皆有窩。庚子春，命我王考炯庵公，抄部目監題。命尚衣主簿曹允亨，題書名，寫字官題部，凡四十目訖抄部目。」〈圖書集成辯證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首爾：東國文化社，1959），卷四，頁101。

¹⁵ 《日省錄》（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卷十，「正祖二年（1778）3月25日條」，頁56。《內閣日曆》云：「上在昌德宮，閣內無事。徐命膺以《圖書集成》裝潢事入來。」正祖三年（1779）2月29四條。所謂《內閣日

其次，正祖四年庚子（1780）1月9日，正祖命奎章閣檢書官李德懋、柳得恭（1749-1807）、朴齊家（1750-1805）、徐理修（1749-1802）等人，將《圖書集成》的小題目抄出來。¹⁶李德懋等人把《集成》分編次序，而且將小題目抄出來編成一部目錄。到了2月21日，他們終於完成一本目錄，¹⁷稱為《圖書集成分編第次目錄》。¹⁸

最後，正祖五年（1781）5月28日，正祖命當時著名的書法家曹允亨（1725-1799）題其冊名，叫寫字官題部目。¹⁹之後，正祖還一直關心《集成》的整理工作，所以問：「《圖書集成》冊題寫出者，今為幾何？」²⁰同年11月16日，又問：「《圖書集成》題目今既了當耶？」當時，負責這件事情的沈念祖回答說：「大小題目則今已了當。」²¹

除此之外，當時朝廷閣臣為了有效地管理《集成》，繼續做了一些措施。如到了正祖五年（1781）十月，他們發現藏於皆有窩的《集成》，「已有蠹蝕處」。閣臣們頗為擔心，因而為了妥善保管和方便閱讀，提

曆》就是奎章閣的日記，其記錄範圍自正祖三年（1779）一月至高宗二十年（1883）二月，其內容主要是有關奎章閣的文化事業，如御制編寫、奉安、刊書、印書、曬書、頒書、進書、檢書、書目編纂、活字、地圖製作等。現藏於奎章閣，筆寫本，請求記號為奎13030-v.1-1249。

¹⁶《內閣日曆》云：「下教曰：《圖書集成》小題目使檢書官抄出，直閣入來看檢。《圖書集成》小題目抄出始役。」正祖四年（1780）1月9日條。

¹⁷李光葵，〈先考積城縣監府君年譜上〉，《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9冊，卷七十，頁286；《內閣日曆》云：「上在昌德宮，閣內無事。《圖書集成》小題目抄出畢役。」正祖四年（1780）2月21日條。

¹⁸筆寫本（請求記號為奎7360）。一冊（40張），四週雙邊，半郭19.8×13.6公分。十行二十一字，小注雙行，版心上花紋魚尾。此目錄僅記載內容，並無記錄卷數。《奎章閣韓國本圖書解題·史部》（首爾：奎章閣，1993），卷4，頁535。

¹⁹《內閣日曆》云：「上曰：《圖書集成》題目尚未書之，曹允亨可能書之乎？（鄭）民始曰：向聞允亨言則渠當書呈云矣。上曰：然則與闕內入直官相換未極熱前，使之書之好矣。」正祖五年（1781）5月27日條。

²⁰《內閣日曆》，正祖五年（1781）10月25日條。

²¹《內閣日曆》，正祖五年（1781）11月16日條。

出了些建議，如「皆有窩書冊無以頻頻曬閱，雖以《圖書集成》觀之，不至屢年已有蠹蝕處，甚可悶也。（沈）念祖曰，內藏冊子，閣臣若有考見事，則以牙牌出納之意曾有筵教矣。此後則雖非《圖書集成》，凡窩中所有書籍，入直閣臣如欲出見則以牙牌出納，一以為閣臣考閱之益，一以為書籍翻曬之地似好矣。」²²又說：「（沈）念祖等曰，《圖書集成》之留置院中，雖已屢閱月，而是大帙未見面之卷尚多餘數，待其畢看入置之後，當以牙牌依定式請出諸僚所欲觀之書，各自隨意繙閱矣。」²³同時他們發現當年徐命膺所做的騰置目錄多有差誤者，則建議「今方一一校正」²⁴，藉此想提供閱讀上的方便。

總之，《集成》在1776年傳入朝鮮之後，大約至1782年為止，正祖一直關心此部大型圖書，為了妥善保管以及利用，做一些工作，如重新裝潢、編《圖書集成分編第次目錄》等。²⁵之後，奎章閣雖然經過動亂與戰爭等，其藏書往往面臨燒毀或流失的危機，而《集成》一直藏於奎

²² 《內閣日曆》，正祖五年（1781）10月25日條。

²³ 《內閣日曆》，正祖六年（1782）3月3日條。

²⁴ 《內閣日曆》云：「（沈）念祖曰：大小題目則今已了當，而每匣付標紙書各編各典名目，然後考覽之際，許多卷帙可以推尋，而年前提學徐命膺所騰置目錄多有差誤者，今方一一校正，留置院中原冊亦以此目錄相準逐匣付標紙，日後考閱時以此照彼，則可除搜訪之勞矣。」正祖五年（1781）11月16日條。

²⁵ 參與此項工作的人，往往覺得很榮幸，如李德懋校勘《集成》時，曾說：「臘雪今年不見飄，澄暄氣候暖微宵。瑯函校獻紅雲座，珂勒聯驅綠水橋。鬢髮潛驚相對罕，登音每歎所居遙。光陰鼎鼎閒忙裡，傾釀何須待翌朝。時校訖《圖書集成》，第三及之，陶靖節詩宇暖微宵。」〈同在先訪鍾崗趙進士煥逢李存菴崇運及曾若、惠甫〉，《雅亭遺稿》四，《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7冊，卷十二，頁204。又朴允默談及金鶴聲時，說：「筆家盛譽受先王，流播人間藉口香。內府圖書五千卷，拂塵他日挹餘光《圖書集成》小題目，承命書進故反之。法地象天各有宜，百家無復致真知。先生一去無因問，獨抱黃庭泣墨池。」朴允默，〈挽金翁鶴聲〉，《存齋集》，《韓國文集叢刊》292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卷二，頁25。

章閣，保存到現在，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²⁶

（二）朝鮮學界對於《集成》的認識

接下來要探討的是朝鮮學界怎麼看待《集成》的問題。

首先，我們查看相關資料，就可知道朝鮮學者較為詳細地知道《集成》的相關內容：如李奎景（1788-1856）簡單扼要地指出《集成》的內容、編纂與刊印過程²⁷，並認為《集成》是本無收錄道、釋兩家書籍的儒家經典²⁸；李德懋則說明《集成》卷帙浩繁，可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相比²⁹，甚至知道「中國富商購《圖書集成》三部，輸于日本長崎島，一部在長崎官庫，二部入江戶」³⁰的事實；成海應則指出刊印《集成》時所使用的銅活字，歷年既久，「或被竊缺少」的事實³¹。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看見《集成》的人，均高度評價《集成》的文獻價值，因此認為《集成》是「漢唐以來似未有如此該博之書」³²、「希

²⁶ 奎章閣所藏《集成》（請求記號為奎貴中2555-v.1-272），共5022卷272冊。書中有「極」、「萬機之暇」、「弘齋」、「朝鮮國」和「帝室圖書之章」等藏書印。

²⁷ 〈圖書集成辨證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四，頁101-102。

²⁸ 〈釋典總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三十九，頁243。

²⁹ 〈永樂大典〉，《盎葉記》三，《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8冊，卷五十六，頁538。

³⁰ 〈圖書集成〉，《盎葉記》四，《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9冊，卷五十七，頁10。

³¹ 成海應在《燕中雜錄·書籍·圖書集成》云：「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板，排印葺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于咎。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研經齋全集·外集》，《韓國文集叢刊》278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卷六十七，頁258。

³² 〈召見右議政徐命善、內閣提學徐命膺、藥院副提調洪國榮于誠正閣〉，「予謂命膺曰：『卿於入直後，詳見《圖書集成》乎？』命膺曰：『詳見其冊子，則漢唐以來似未有如此該博之書矣。』」《日省錄》，卷十，「正祖二年（1778）3月26日條」，頁59。

古之文多載其中」³³。李德懋甚至說在正祖二年（1778）他燕行時，曾經在書坊，得見《集成》散帙者，「如獲吉光片羽，詫以為奇觀」，後來受命親自翻閱《集成》時，感到「真不負平生之眼」³⁴。

另一方面，一些朝鮮學者認為《集成》的編纂目的並不單純，其中存在著一些不良的政治意圖。正祖云：

宋太宗、明成祖，《太平廣記》、《冊府元龜》等書，廣延天下名士，彙成一部巨帙，蓋賺得英雄之意。清人亦效之，《淵鑑類函》、《佩文韻府》、《書畫譜》、《字典》、《朱子全書》、《會典》、《一統志》、《圖書集成》、《皇輿表》、《八旗通志》、《古文淵鑑》諸種，皆出一代鉅匠之手，彬彬可觀，而人不暇天下事，至白紛汨沒朱墨中。惟呂留良、顧寧人諸子，不入其白，卓犖可尚。³⁵

正祖認為宋、明、清三代進行巨帙編纂事業的真正目的是「人不暇天下事，至白紛汨沒朱墨中」。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看法不只是正祖一人的，朴趾源（1737-1805）亦在《熱河日記》中談及清朝「徵海內之書，為《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率天下而倡之曰，此紫陽之緒言，而考亭之遺旨也。其所以動遵朱子，非他也，騎天下士大夫之項，扼其咽而撫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脅，區區自泥於儀文節目之中，而莫之能覺也。」³⁶因此他把康熙、乾隆編纂《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事業，稱為「嗚呼！其愚天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所謂購書之禍甚

³³ 〈召見直提學沈念祖、鄭志儉于誠正閣〉，「予曰：『《圖書集成》，予未得遍覽，果謂何等書耶？』（鄭）志儉曰：『希古之文多載其中矣。』」《日省錄》，卷二十四，「正祖五年（1781）10月13日條」，頁30。

³⁴ 〈圖書集成〉，《盎葉記》四，《青莊館全書》，卷五十七，《韓國文集叢刊》259冊，頁8。

³⁵ 〈人物〉，《日得錄》十二，《弘齋全書》，卷百七十二，《韓國文集叢刊》267冊，頁366-367。

³⁶ 〈審勢編〉，《熱河日記》，《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社，2001），卷五十六，頁294。

於焚書者，正指此也。」³⁷在此，附帶要說明的是，當時閱覽《集成》的朝鮮學者似乎不知道《集成》的真正編纂者為陳夢雷的事實，³⁸如李德懋談及《集成》「自康熙朝設局編纂，諸臣因循未成。雍正初年，切責詞臣，董督三年，書始成」的事實，並指出「蔣廷錫為總裁官」。³⁹

三、《集成》對朝鮮社會的影響

《集成》傳入朝鮮之後，一直藏於奎藏閣，這自然會限制《集成》為朝鮮文人學者所利用。而實際上，一些文人學者能夠閱覽它⁴⁰，而且

³⁷ 同前註，朴趾源認為康熙、乾隆善於制蒙古、西藩等，惟至於中土，「其心以為天下之小民，薄其賦斂則安矣，安知不反便乎我之帽服，而不欲變我之制度乎？但天下之士大夫，顧無可安之術，則姑尊朱子之學，大慰遊士之心，其豪傑敢怒而不敢言，其鄙佞因時義而為身利。一以陰弱中土之士，一以顯受文教之名，非秦之坑殺而乾沒於校讎之役，非秦之燔燒而離裂於聚珍之局。嗚呼！其愚天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所謂購書之禍甚於焚書者，正指此也。」頁295。

³⁸ 有關陳夢雷編纂《集成》的始末，可參看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編纂考〉，《古今圖書集成研究》，頁27-42。

³⁹ 〈圖書集成〉，《盎葉記》四，《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9冊，卷五十七，頁8。李德懋案語說：「蔣廷錫字揚孫，江南常熟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太學士。謚文肅。著有《青桐軒》及《秋風片雲》諸集。卓識長才，蒞事精敏，工繪花卉。《圖書集成》，不惟部目之整齊，其圖畫精妙纖悉，無毫絲差爽。以其工畫者看詳，恨無編纂諸臣，凡幾人列書于卷首。」頁9。

⁴⁰ 奎章閣原本是王室圖書館，能夠自由進出的人很有限，那麼何以一些文人學者可以閱覽它呢？那似乎是跟正祖的積極鼓勵有關，正祖希望諸臣批閱《集成》，要達到「典籍之潔淨，人才之作興」的目的。正祖在〈訓語〉中云：「自古祕府之官，必選聰俊博雅之士以充之者，非但為典守出納而已，有逸則補之，有誤則正之。而方其補之正之之時，所以廣其學富其識者，為效尤多，故漢、唐、宋、明諸名臣，莫不自祕府中培養成就。是名臣者，又莫不以校對蒐討，作為己任。誠心理會，殆無異於飢者之求食，渴者之求飲。此

依據《集成》的內容，從事築城、製作地圖、考證、輯佚等工作，這無疑對當時朝鮮社會的各方面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以下《集成》對朝鮮社會的影響，要分幾個方面來加以論述。

（一）對於築城方面的影響

正祖的父親思悼世子（1735-1762）⁴¹在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中，被迫關在米櫃而不幸夭折。⁴²正祖對於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即位之後，正祖十三年（1789）將思悼世子的墓陵遷到水原。然後，正祖為了紀念思悼世子，決定修築華城。實際上，他築造華城有另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消除朋黨的弊端，同時要實行強而有力的王道政治，因而他構想一個政治中心兼位置於漢城南邊的軍事要衝地，那就是華城。

水原華城自1794年1月起工，至1796年9月完工，由奎章閣文臣丁若鏞（1762-1836）主導此事。當時丁若鏞利用起重架搬運重石材，效率地加以築城。值得注意的是，丁若鏞之所以能夠製造起重架，是因為他

其所以君焉而治具卓犖，臣焉而事業光輝，不若後世藏書之無益於實用也。近來《內閣書冊》，固多善本，而其中訛畫逸篇，亦安保其必無，如《圖書集成》、《經解》等巨帙，使之出置直院者。予意蓋欲使在直及仕進諸臣，相與披閱。而典籍之潔淨，人才之作興，庶幾其一舉兩得。近聞隨手散漫，徒致卷帙之狼藉，無人照管，或慮部位之遺落云。予為諸閣臣，誠不勝慨然。此後則勿論舊藏與新購，各取其所欲見者，從容默坐，首尾看過。而其中誤落者，依古文雌黃滅字之例，以朱墨刊正可也。」《日得錄》十四，《弘齋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67冊，卷百七十四，頁397。

⁴¹ 朝鮮二十一代王英祖的第二王子。字允寬，號毅齋。其母親為映嬪李氏，妻為惠慶宮洪氏。

⁴² 這事件在當時老論與少論的政爭過程中，可說由老論勢力來剷除思悼世子的。朝鮮英祖三十八年（1762），英祖因為由老論方面提出的一些誣告事件與思悼世子本身的不正常行為，終於命思悼世子自盡，而思悼世子卻不聽從。英祖最後廢思悼世子為庶人，而且把他關在米櫃而死。相關內容可參看《朝鮮王朝實錄·英祖實錄》、惠慶宮洪氏《閑中錄》以及李光鉉《壬午日記》等。其中，2000年新發現的《壬午日記》的內容比較接近客觀的歷史事實，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重視。

受到《集成》所收錄的《奇器圖說》之啟發。丁若鏞在〈自撰墓誌銘〉中交代他製造「起重架圖說」的經過：

厥明年壬子春，鏞選入弘文館為修撰，赴內閣修賡和詩卷。四月先考捐館于晉州，聞急至雲峰，戴星既月，反樞于忠州。既葬反哭于馬峴，上數問存沒。是年冬，城于水原。上曰己酉冬周橋之役，鏞陳其規制，事功以成。其召之，使于私第條陳城制，鏞乃就尹保約及柳文忠城說，採其良制。凡譙樓、敵臺、懸眼、五星池諸法，疏理以進之。上又內降《圖書集成·奇器圖說》，令講引起重重之法。鏞乃作起重架圖說以進之。滑車鼓輪，能用小力轉大重。城役既畢，上曰「幸用起重架，省費錢四萬兩矣」。⁴³

由此可知，丁若鏞在築造華城時擔任最重要的角色。壬子（1792），丁若鏞先受命設計華城之制，參考了柳成龍（1542-1607）的《城說》和尹耕（1567-1664）的《保約》。柳成龍和尹耕各經過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所以非常清楚地知道朝鮮城郭的不足之處。丁若鏞正好從他們的著作中找出朝鮮城郭的問題以及因應之道，最後把城郭建築技術與方法整理出來。之後，他再利用《集成》收錄的《奇器圖說》而作「起重架圖說」。總之，丁若鏞所製造的「起重架」、「滑車」與「鼓輪」等，都「能用小力轉大重」，無論在人力、經費和時間上，無不節省，因而築造華城起了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丁若鏞對於《奇器圖說》表示非常濃厚的興趣。丙辰（正祖二十年，1796），丁若鏞看到《奇器圖》之後，叫「工畫者金生移描」，而且認為《奇器圖》所載的各種技術，對於兵農諸方面有所幫助。丁若鏞對《奇器圖》如此關注無疑與他的經世思想有密切關係。

那麼丁若鏞製造的「起重架」到底受到《奇器圖說》多少影響呢？丁若鏞說：

內降《奇器圖說》所載起重之法，凡十一條，而皆粗淺。唯第八、

⁴³ 〈自撰墓誌銘〉，《丁茶山全書·詩文集·墓誌銘》（首爾：文獻出版委員會，1960），卷十六，頁316。

第十、第十一圖，頗為精妙。然第十圖須有銅鐵螺絲轉，方可為之。今計雖國工，不能為銅鐵螺絲轉，至於銅輪之有齒者，亦必不能。故只取第八、第十一，參伍變通。⁴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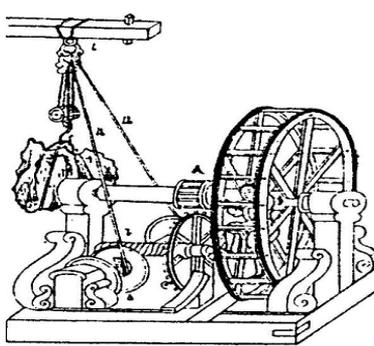
丁若鏞在十一個有關起重之圖中，原本認為第八、第十、第十一圖，頗為精妙。而最後丁若鏞因為第十圖「須有銅鐵螺絲轉」而決定不用，只取第八和第十一圖。更明確地說明丁若鏞所依據的是甚麼，而且其變通的程度如何？下面列出《集成·奇器圖說》的第八、第十和第十一圖跟丁若鏞製造的起重架的全圖。

圖八第起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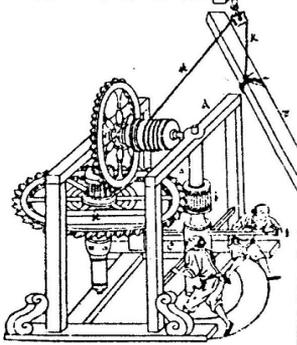
圖一：《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奇器部》

圖十第起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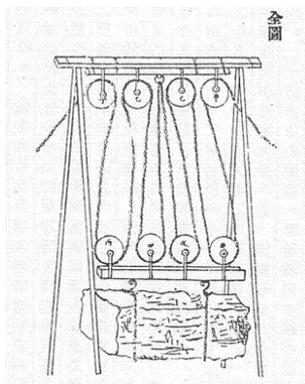


圖二：《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奇器部》

圖一十第起重



圖三：《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奇器部》



圖四：丁若鏞《丁茶山全書·起重圖說》

⁴⁴ 〈起重圖說〉，《丁茶山全書·詩文集·說》，卷十，頁209。

從上面列出的《集成》所載之三個圖來看，除了丁若鏞決定不用的第十圖以外，在外觀上，丁氏所製造的起重架與《奇器圖說》的第八、第十一起重圖也有較大的出入。從此我們不難得知丁氏從第八、第十一圖中得到起重架原理上的概念。只是當時丁若鏞所看到的是《集成》所載刪節本《奇器圖說》，因而丁若備認為「其圖說率略未詳，無以解其機軸之所聯絡，茲可恨也。」⁴⁵不然丁氏從《奇器圖說》中獲得的知識一定會更豐富。

（二）對於軍事方面的影響

朝鮮王朝原本強調文治，因而其軍事力量則一向較為薄弱。尤其是，朝鮮經歷了壬辰倭亂，丙子胡亂，軍事方面的弊端更表露無遺。因此，朝鮮為了自身安全，需要整頓軍事事務，其中一個環節就是編纂武藝書籍，宣祖31年（1598）由韓嶠（1556-1627）編纂的《武藝諸譜》和英祖35年（1759）奉敕撰《武藝新譜》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正祖年間出現的《武藝圖譜通志》亦與上述編纂武藝書籍的實際需求有密切關係。尤其是，正祖在當時強調利用厚生的實用主義學術思潮中，重視武的功能，主張把文跟武並用，才可以國運昌盛。⁴⁶正因為如此，正祖一方面設置了新軍營「壯勇營」，透過它培養幫助他的新興武班，一方面編纂《武藝圖譜通志》，想讓新興武班學習它，同時要普及標準的武藝

⁴⁵ 〈跋奇器圖帖〉云：「右《奇器圖》一卷，即內庫所藏《圖書集成》五千二十二卷之一卷也。丙辰冬，余在奎瀛府校書，得見《奇器圖》，歸而令工畫者金生移描。凡引重起重諸器及解木、解石、轉磨、水銃、虹吸、鶴飲之屬，無不畢具。兵農之家，苟講而行之，不為無補也。但其圖說率略未詳，無以解其機軸之所聯絡，茲可恨也。」《丁茶山全書·詩文集·跋》，卷十四，頁291。

⁴⁶ 〈文武〉，〈策問一〉，《弘齋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63冊，卷四十八，頁228。

體系，藉此試圖鞏固王權。⁴⁷

《武藝圖譜通志》是在正祖十四年（1790），由李德懋、朴齊家和白東修（1743-?）等奉正祖之命而編纂的。此書繼承《武藝諸譜》和《武藝新譜》的傳統，並參考《紀效新書》、《武備志》、《內家拳法》、《刀劍錄》等韓、中、日三國的書籍一百四十六種，可謂朝鮮傳統武藝的集大成之作。李德懋認為編纂《武藝圖譜通志》是當務之急，並敘述其編纂經過：

臣等謹考班固次兵家流，權謀形勢陰陽以外，別敘兵技巧。蓋習手之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新羅之《武烏兵法》，高麗之《金海兵書》，逸而不傳，今不可考。而中國歷代器械之書，亦或不傳。言制造者，莫詳於《考工記》，而辭義奧邃。六韜有兵用篇，略而不備。惟宋朝魯公亮《武經總要》，兵器圖式，最號精該。王氏《圖會》、戚氏《新書》、茅氏《武備志》及《圖書集成》，戎政之典，咸宗是書。而韓嶠之書既出，戚氏源派明白，有圖有譜。按而行之，如指諸掌，亦可謂有用之學矣。……此圖譜之所作，而為今日之急先務也。是書既以列朝所撰兵書，該載卷首，而當寧御纂兵書，如《兵學通》、《隸陳總方》已刊頒者外，內府騰本，猶數十餘種，臣等循次編錄，則上以事近夸耀不許，至矣哉！聖上撝謙之德也。蓋嘗論之，《兵學通》為營陳之綱領，《武藝通志》為技擊之樞紐。夫通者，明也該也，體用互須，本末相維。談兵之家，捨此二通，亦奚以哉！⁴⁸

從上述引文中，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集成》為編纂《武藝圖譜通志》時的資料來源之一。我們從《武藝圖譜通志》的「引用書目」中可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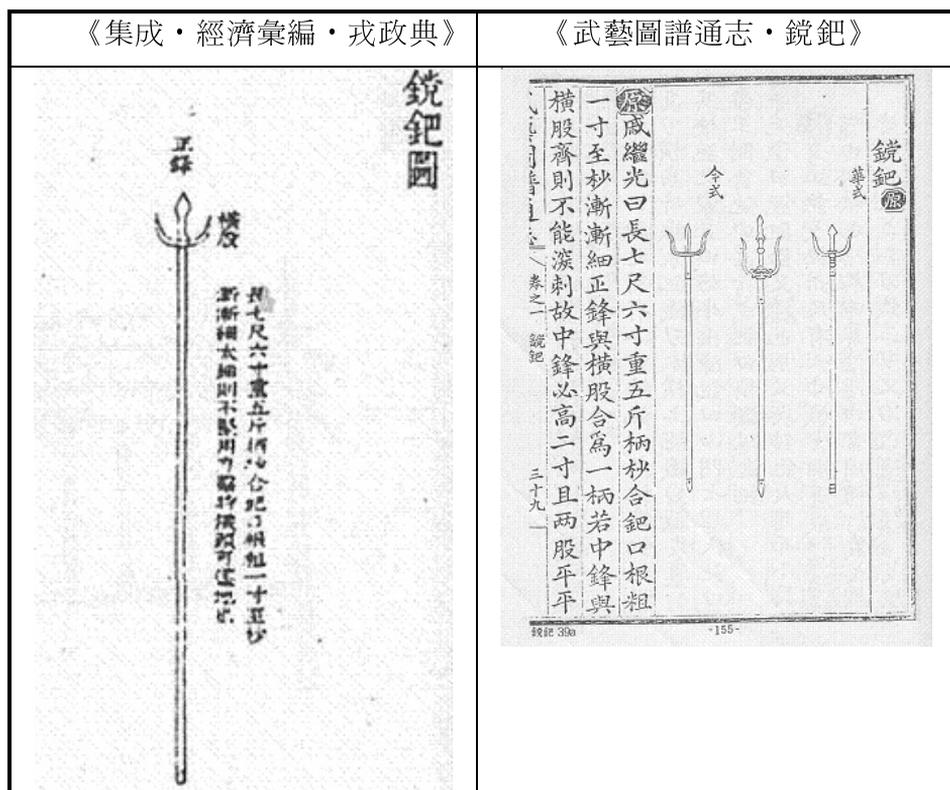
⁴⁷ 有關《武藝圖譜通志》的編纂動機與背景，參看裴祐晟，〈正祖的軍事政策與『武藝圖譜通志』編纂的背景（譯名）〉，《震壇學報》91，頁331-354。

⁴⁸ 李德懋，〈武藝圖譜通志附進說〉，《編書雜稿》四，《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7冊，卷二十四，頁361-362。

《圖書集成》的存在，因此上述引文的內容是確實無疑的。不過，實際上，《武藝圖譜通志》的最主要資料來源不是《集成》，而是戚繼光的《紀效新書》與茅元儀的《武備志》⁴⁹。

但是，在編纂《武藝圖譜通志》時，編纂者確實從《集成》中取一些資料，來說明某些觀點。那麼《武藝圖譜通志》到底利用《集成》的甚麼內容呢？仔細查看，我們不難發現《武藝圖譜通志》直接引用《集成》的是《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的內容，其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銳鈿〉部分。



⁴⁹ 〈凡例〉云：「戚氏《紀效新書》、茅氏《武備志》俱為是編之表準，匪比他書之泛引者。故他書則曰某書曰云云。」李德懋、朴齊家等奉敕撰，《武藝圖譜通志》（光明市：弘文館，1990），卷首，頁23。

第二、〈棍棒〉部分：

| | |
|---|---|
| 《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器械部總論》 | 《武藝圖譜通志·棍棒》 |
| 若夫戛之為戛，略如今俗所謂木棍擊馬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刀也。 ⁵⁰ | 《圖書集成·器械部總論》曰：「戛之為戛，略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依古制，備此一器，以擊馬足，亦不減宋人用麻紮刀《宋史·岳飛傳》曰：『兀術三人為聯，號拐子馬，飛戒步卒以麻紮刀，勿仰視，斫馬足』也。」 ⁵¹ |

可見《武藝圖譜通志》首先在《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中取了鏡鈹的圖畫部分，底下的案語說：「第一圖，戚書及《武備志》、《圖書集成》皆如此。」⁵²其次，「棍棒」部分則除了《宋史·岳飛傳》的內容補充之外，其所載內容與《集成·戎政典》的幾乎一樣。據以上的比較，可知《武藝圖譜通志》確實從《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中取些資料，有的照樣記錄下來，有的加上補充資料。

（三）對於地理方面的影響

在《集成·職方典》所載的各種地理知識，使得當時朝鮮學者的地理知識有所擴大，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李奎景在引用《說文解字》、《論語正義》、《爾雅疏》、《後漢書》、《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和《三國遺史》等史料，探究「九夷」說時，最後依據《集成·方輿彙

⁵⁰ 陳夢雷、蔣廷錫等輯，〈器械部總論〉，《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成都：中華書局、巴蜀書社，1985），頁92906。

⁵¹ 〈棍棒〉，《武藝圖譜通志》，卷之四，頁530。

⁵² 〈鏡鈹〉，《武藝圖譜通志》，卷之一，頁156。

編·邊商典·朝鮮部彙考》的資料，主張所謂「東方九夷，則宜在朝鮮疆域內」⁵³的看法。而對於這方面，最顯著的影響無非是地圖方面的，換言之，《集成》所載各中國地圖對於朝鮮學界的地理認識有很大的影響。

第一、《集成》傳入朝鮮，使得朝鮮學者正確地描繪中國、琉球、日本地區，起了正面的作用，這是因為《集成·職方典》收錄中國各省圖與郡縣圖，甚至提供了與中國連接的各國的地理資料。如《海東三國圖》（奎章閣藏，奎15506）較為細膩地描繪朝鮮、中國、日本和琉球地理，連鄰國的北極高度也記載，這很有可能受到《集成·職方典》所載地理資料的影響。⁵⁴另外，《輿地圖》（奎章閣所藏，古4709-78）所載的中國各省地圖與《中國輿地圖》（奎章閣所藏，古4709-29）的中國地圖的外形亦直接描繪《集成》所載相關地圖。⁵⁵

第二、《集成》傳入朝鮮，使得有關朝、清邊疆地區與滿州地區的地理認識有所擴大。在《集成·職方典》所載的地圖中，特別引起朝鮮關心的是朝、清的邊疆地區和滿州地區的地圖。因為朝鮮在正祖以前，除了《盛京志》之外，無法蒐集有關邊疆和滿州地區的地圖資料。朝鮮通過《集成·職方典》所載中國地圖，比以前更為詳細地掌握朝、清邊疆地區和滿州地區的地理知識。

其中，較為顯明的例子就是《西北界圖》，它是正祖以後製作的官

⁵³ 東方九夷六部辨證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八，頁282。

⁵⁴ 裨祐晟，《朝鮮後期國土觀與天下觀的變化》，頁404。《海東三國圖》，作者未詳。一張，筆寫本，248×264.4cm。整體而言，此圖中的朝鮮地圖較為簡單。相較之下，與朝鮮邊界連接的中國、日本、琉球地區，無論其道路或地名均為詳細。

⁵⁵ 《輿地圖》和《中國輿地圖》二者與《集成》的關係，可參看裨祐晟，《朝鮮後期國土觀與天下觀的變化》，頁404-405。《輿地圖》，作者未詳。三帖一軸，筆寫本，彩色圖，31×21.5cm。第一帖為天下全圖、北京都城三街六市五壇八廟全圖，第二帖為海東八道圖，第三帖為中原十六省圖。《中國輿地圖》，作者未詳。一帖（二十八折），寫本，彩色圖，28.3×18cm。

撰地圖。⁵⁶在《西北界圖》中有關滿州地區的部分是利用《集成·職方典》的地圖來製作的，而且在《西北界圖》左上方有滿州地區的地理說明，這一部分來自於《集成》。如《集成》談及「長白山」時說：

西南流入海者為鴨綠江，東南流入海者為土門江，北流遶船敞城東南。出邊受諾尼江東注，北受黑龍江，南受烏蘇哩江，曲折入海者為混同江，並無阿也苦之名，古今稱呼之異也。⁵⁷

《西北界圖》云：

西南入海者為鴨綠江，東南流入海者為土門江，北流繞永吉□南山邊，為松花江東注，北受諾尼江，又受黑龍江，南受烏蘇里江，曲折入海者為混同江。⁵⁸

由此可見，《西北界圖》的地理說明確實來自於《集成》（參考圖五與圖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西北界圖》和《集成·職方典》的地圖亦有所出入：一般而言，《集成·職方典》所載地圖，記錄了主要郡縣、山川和主要省的名稱；《西北界圖》則比《集成》記錄了更多的地名，特別是有關驛站的記載頗為詳細（參考圖七與圖八）。又《集成》所載地圖並無記載道路，而《西北界圖》以紅色線描繪各地的道路，如北邊則到黑龍江，東邊則至寧古塔，西邊則至山海關。

總之，《集成》傳入朝鮮之後，朝鮮利用《集成·職方典》的內容而編纂了多樣的地圖，這樣的現象，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四）其他

除了上述的《集成》對於朝鮮社會的影響之外，朝鮮學者還從多方

⁵⁶ 有關此地圖的特色與編撰時期的論述，可參看裴祐晟，《18世紀官撰地圖製作與地理認識(譯名)》(首爾:首爾大學史學科博士論文,1996),頁117-121。

⁵⁷ 〈烏喇寧古塔部·烏喇寧古塔山川考·長白山〉,《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一百七十九卷,頁9348。

⁵⁸ 《西北界圖》第六冊,現藏奎章閣,請求記號為「古47098900」。

面利用《集成》，以下分別論述之。

首先，到了19世紀，朝鮮學界因其本身學問的累積與清朝考證學的影響，而出現了李裕元（1814–1888）的《林下筆記》、作者未詳的《東典考》等百科全書類的書籍。李奎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就是這種學術風氣之代表作，尤其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受到其祖父奎章閣檢書官李德懋的《青莊館全書》之影響最大，它可說是研究19世紀朝鮮思想史的重要資料。《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共有六十卷，其內容包含經學、歷史、天文地理、佛教、道教、西學、禮制、災異、文學、音樂、音韻、兵法、礦物、早目、魚蟲、醫學、農業、礦業、貨幣等共1,417項目，以「辨證說」的體裁，用考證的方式進行論說。有趣的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往往從《集成》中找出議論的根據，先看看《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引用《集成》的內容：

| | 卷次 | 分類 | 篇名 |
|----|------|------|------------|
| 1 | 卷四 | 典籍 | 圖書集成辨證說 |
| 2 | 卷四 | 典籍 | 四庫全書辨證說 |
| 3 | 卷八 | 邦國 | 東土九夷六部辨證說 |
| 4 | 卷二十五 | 雜器 | 螺甸辨證說 |
| 5 | 卷二十七 | 博物 | 物極生變辨證說 |
| 6 | 卷三十三 | 鳥獸雜說 | 鳥獸首尾奇偶辨證說 |
| 7 | 卷三十八 | 地理總說 | 萬國經緯地球圖辨證說 |
| 8 | 卷三十九 | 釋典總說 | 釋氏雜事 |
| 9 | 卷四十一 | 論史 | 西洋通中國辨證說 |
| 10 | 卷五十一 | 獸 | 狐仙辨證說 |

我們可以把《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引用《集成》的內容分為幾個方面來說明：第一、正如前述，李奎景在〈圖書集成辨證說〉中簡單扼要地說明《集成》的編纂過程及傳入朝鮮的經過，而且把它當作中國「圖書經史之變」的一個極限⁵⁹，這足以說明李奎景對《集成》的重視。但

⁵⁹ 〈物極生變辨證說〉云：「至於圖書經史之變，《冊府元龜》而極矣。《冊

是，在〈釋氏雜事〉中，卻指出「《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四庫薈要》並黜道、釋不收。雖闢異教宜然，而欲考歷代事實，則似不然矣」的不足，那是跟他認為「世之稱儒、道、釋三教者，殆如鼎足，厥有久矣」⁶⁰的思想有密切關係。第二、李奎景通過〈西洋通中國辨證說〉和〈萬國經緯地球圖辨證說〉，說明西學東傳的歷史事實，而且說：「此西洋船舶及洋人漂泊潛越之大略也。大抵西洋之於中原與東國，若風馬牛不相及，而航海來泊，甚可異也。」⁶¹但他對西學的態度侷限於西學本於中學之說，因此他以曆法為例，認為：「大明西人之功，而詢其所自，皆本中土所流傳。」⁶²這種看法與當時大部分中國學者的看法確實有相同之處。第三、李奎景利用《集成》的內容，證明有關朝鮮的各種事實。如在〈鳥獸首尾奇偶辨證說〉中，利用《集成·朝鮮部彙考》的內容，說明「以東國為青丘，則狐之九尾者，出於我東地方。」的看法。⁶³除此之外，如〈螺甸辨證說〉、〈狐仙辨證說〉等都屬於這一類的記載。

府元龜」之極，而《永樂大典》而極矣。《永樂大典》之極，而《圖書集成》而極矣。《圖書集成》之極，而《四庫全書》而極矣。」《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二十七，頁771。

⁶⁰ 〈釋氏雜事〉，《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三十九，頁243。

⁶¹ 〈西洋通中國辨證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四十二，頁357。

⁶² 同前註，〈西洋通中國辨證說〉云：「凡曆法，大明西人之功，而詢其所自，皆本中土所流傳。徐玄扈光啟篤信不遺，稱以小義和者，非溢美也。中原諸家，以為三代盛時，聲教四訖，重譯來王。其時書籍，流傳海外。周末，疇人子弟，失職外散，遯處四海。海外支流，反得其傳，而四海中昧谷，獨通中夏。故西學有本，良有以也。於西域之音韻，龜茲之樂律，可徵也。」頁357。

⁶³ 〈鳥獸首尾奇偶辨證說〉云：「青丘，海東地名，《山海經·海外東經》。青丘國，其人食五穀，衣絲帛。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大荒東經》，大荒中，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注》：太平則出而為瑞，《圖書集成》載此條於《朝鮮部彙考》。以東國為青丘，則狐之九尾者，出於我東地方耶。九頭鳥出見為災，九尾狐出見為祥，亦為吉凶之對偶者，豈非考且神哉！」《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三十三，頁977。

其次，《集成》往往成為蒐集有關朝鮮史料的來源。中國與韓國因地緣接近，雙方往來頻繁，很自然地在中、韓曾出現過不少有關彼此的著作。歷來，兩國學者均對這方面的資料，加以關注。因為如此，《集成》傳入朝鮮之後，有的學者從《集成》中蒐集有關朝鮮的資料。如李德懋談及《高麗圖經》時指出「《雞林志》八條，載於《圖書集成》。徐競《使高麗錄》十五葉，亦載《集成》。錢塘潘香祖庭筠，嘗為余言，家藏抄本圖經五卷云。」⁶⁴《雞林志》和徐競（1091-1153）的《使高麗錄》都是中國人所撰的有關韓國之史料，這無疑引起李德懋的興趣。李德懋又利用《集成》，從事輯佚工作，如李德懋從《集成·新羅部藝文》的內容中，找出凡十四位唐人送人之新羅詩：

唐人送人之新羅詩，載於《圖書集成·新羅部藝文》者。凡十四人，陶翰、顧況、吉中孚、姚鵠、權德輿、錢起、李益、耿漳、皇甫冉、劉禹錫、張籍、釋無可、許琳、李昌符詩各一篇，張籍獨有二篇。又載張九齡敕新羅王金興光案興光，即聖德王，初諱隆基，避玄宗諱，改興光。《唐書》又作志誠書三篇，敕王金重熙案重熙，似是孝成王承慶，或景德王憲英別名，而不可攷書一篇。⁶⁵

另外，李德懋說明《春明夢餘錄》載崇禎五年朝鮮國王仁祖「請追崇疏」

⁶⁴ 〈高麗圖經〉，《盎葉記》五，《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9冊，卷五十八，頁38。

⁶⁵ 〈唐人送人之新羅〉，《盎葉記》五，《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9冊，卷五十八，頁30。附帶說明的是，李德懋亦利用朝鮮文獻來指出中國文獻之不足。如他載《三國史記》的（唐）顧雲贈崔致遠的詩，說明此詩《全唐詩》遺漏的事實。李氏云：「唐顧雲贈崔文昌致遠詩曰：『我聞海上三金鰲，金鰲頭戴山高高。高山之上兮，珠宮貝闕黃金殿。山之下兮，千里萬里之洪濤。旁邊一點雞林壁，鰲山孕秀生奇特。』」此詩載《三國史記·本傳》，而《全唐詩》見漏。又《東文選》〈崔文昌和張進士喬村居見寄詩〉註云，喬字松年，而《全唐詩·小傳》，不著其字。」〈全唐詩所漏〉，《盎葉記》五，《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9冊，卷五十八，頁31。

的事情，同時指出相關文章載於《集成·朝鮮部》。⁶⁶可見他積極利用《集成》從事學術工作的事實。

附帶要說明的是，當判斷在具體的情況下正確的典禮為何時，朝鮮朝廷亦利用《集成》的相關內容。如正祖十九年（1795，乾隆六十年）一月，朝廷討論正祖之母惠慶宮洪氏詣闕宮行禮時的儀節問題。當時，南公轍（1760-1840）上奏摺認為禮曹判書閔鍾顯（1735-1798）的看法最合理，說：「慈殿行禮，當用先朝臨廟之禮者，最有依據，亦合朝典。」⁶⁷問題是，朝廷官員雖然查考歷代禮書，幾乎找不到確鑿的相關例證，幸虧他們找到了一些例證，那就是明嘉靖五年章聖太后在興獻行禮之事與明萬曆八年皇帝帶孝定、孝安等兩位太后詣昭陵之事。其中，嘉靖五年事件之依據是從《集成》所載《大政紀》的內容中找出來的：

謹按《圖書集成》引《大政紀》云：嘉靖五年，帝奉太后，謁興獻廟。諸臣引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及國初禮有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具儀以上，則章聖之於興獻廟，即用謁太廟之禮，不以齊體而略其儀，可推而知也。⁶⁸

朝鮮一向重視禮儀，有時因為禮節問題而發生激烈的爭論⁶⁹，如果考慮

⁶⁶ 〈朝鮮陪臣柳溥〉：「《春明夢餘錄》孫承澤撰，載嘉靖八年朝鮮陪臣吏曹參判柳溥等，辨國係呈禮部文案攷事撮要，尚書李時等，題云云。及嘉靖十三年，使臣蘇洗讓案洗，即世之訛，請許勿禁拘呈文案《攷事撮要》，尚書夏言等題云云。又載崇禎五年，朝鮮國王李仁祖御諱禮重繼序疏案即請追崇疏三文。今不錄，亦載於《圖書集成·朝鮮部》中。」《盜葉記》五，《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卷五十八，頁36。

⁶⁷ 南公轍，〈王大妃殿惠慶宮詣闕宮行禮時合行儀節博攷啟〉，《金陵集》，《韓國文集叢刊》272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卷六，頁104。

⁶⁸ 同上註。這個內容亦見於《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正祖十九年乙卯一月十五日；徐有榘，〈慈殿慈宮詣景慕宮時，合行儀節博考啟〉，《楓石全集·金華知非集一》，《韓國文集叢刊》288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頁315-316。

⁶⁹ 朝鮮因為宮中禮儀，朋黨之間往往會發生激烈的衝突，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朝鮮第十八代王玄宗（1641-1674）時發生的有關喪服問題。孝宗（即

這一點，《集成》被利用於朝鮮王室的典禮問題，其重要性不需待言。

總而言之，《集成》傳入朝鮮之後，雖然一直藏於奎章閣，只有少數人閱覽它，但是它對於朝廷政策的策劃與執行方面，往往提供參考資料與理論的依據，藉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四、文化意義

《集成》傳入朝鮮可說是一段韓、中圖書交流史的佳話，而且《集成》對於當時朝鮮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這樣的現象固然是很重要。而仔細觀察，我們還發現《集成》傳入朝鮮具有更深一層的文化意義。

第一、《集成》流入朝鮮，無疑是18世紀韓、中圖書交流的具體產物。尤其是，《集成》能夠傳入朝鮮，是由當時朝鮮國王正祖主導的。他原本想購買《四庫全書》，給燕行使臣徐浩修等人銀2,150兩，而當時《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尚未完成，無法如願，而轉買了《集成》。正祖購買《集成》之後，還要繼續有系統地購買中國書籍，而編纂了《內閣訪書錄》，持續地讓燕行使臣仔細調查書籍的存藏與否，並盡量購買中國書籍。現查看《內閣訪書錄》的內容，共收錄三百八十五種中國圖書：經部一百三十四種；史部六十四種；子部一百二十四種；集部六十四種。值得注意的是，《內閣訪書錄》是依據乾隆奉敕編纂的《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而編成的，由此窺見，正祖從清朝購買中國書籍的態度多麼積極！正因為正祖的積極推動，到了正祖五年（1781）六月，奎章閣所藏書籍多達三萬餘卷。當時，正祖覺得有必要把蒐集來的書籍做一次整理。因而他命奎章閣直提學徐浩修與徐有渠（1764-1845），依照四部分類法，編纂目錄，這目錄就是正祖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完成的《奎章

玄宗之父）逝世之後，當時的朋黨繞著其母親慈懿大妃到底該穿幾年的喪服問題，展開了禮學討論，使得當時的政局動盪不已，這叫做「禮訟」。

總目》。這目錄共收錄三萬餘卷書籍，其中中國本書籍約二萬卷，韓國本書籍約一萬餘卷。當時，在藏於奎藏閣的圖書中，卷數最多的就是《集成》。⁷⁰

其實，正祖積極購買中國書籍意味著18世紀朝鮮對清朝文化的肯定，《集成》傳入朝鮮又具有代表性。朝鮮經過丙子胡亂，當時國王仁祖飽嚙欺辱，自然朝鮮朝野對清朝的敵意持續高漲。到了孝宗時，為了一雪國恥，曾提倡「北伐論」。同時，朝鮮在文化上，自任為小中華⁷¹，因此雖然在現實中屈服於清朝，而就文化水準而言，卻認為遠遠超過清朝。

但是，朝鮮的這種想法，隨著清朝的穩定發展，加上通過《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文化事業的興起，逐漸有所動搖。以京畿地區為中心的朝鮮學者們，終於發現清朝的文化水準已超過朝鮮，指出所謂「北伐論」很有可能變成一個空虛的口號。所以他們主張把較為先進的清朝文化跟技術文明引進來，以此彌補朝鮮文化的不足。此一主張叫做「北學論」，由洪大容（1731-1783）、朴齊家等通過燕行的機會而較常接觸清朝文化的學者率先提出。隨著時間的經過，北學論的影響力逐漸擴散，很多人都提倡它。我們從丁若鏞的一段話中可窺見當時的風氣：

昔將臣李敬懋嘗謂臣曰：「今兵器，皆是新制。日本鳥銃，今為

⁷⁰ 李裕元《嘉梧稿略·玉磬輒臆記》云：「聚奎樓上，分貯經史子集，總合經部一百十二種；史部一百六十六種；子部二百四種；集部三百二十四種。樓下奉御製御筆一百二十帙，璿牒璿譜七十六帙，御定諸書一百三十八帙。及經部一百三種，史部二百八十六種，子部一百五十六種，集部五百四十七種。宙合樓貯七書十四種。隆文樓所貯群書三百五十一種。隆武樓七百六十七種。東二樓奉御製御筆一百九十三帙。璿牒璿譜五十二帙，御定諸書八十七帙。及唐板經部十五種，史部四十四種，子部三十五種，集部五十七種。常板經部四十一種，史部一百十四種，子部六十六種，集部一百五十二種。其中最多卷者，《圖書集成》一帙，為五千二十二卷也。」《韓國文集叢刊》315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3），冊十四，頁551。

⁷¹ 這方面的論述，可參看鄭玉子，《朝鮮後期朝鮮中華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2001）。

古調。此後南北有憂，不復以烏銃鞭棍至矣。今之急務，在於北學中原，誠識務之言也。」臣謂別設一司，名之曰：「利用監」，專以北學為職。⁷²

《集成》傳入朝鮮的時期，正是朝鮮積極引進清朝文化的開端，象徵著正祖年間朝、清兩國間積極的文化交流之開始。可惜的是，這一部具有當時清朝文化精髓的圖書，一直藏在王室圖書館「奎章閣」，未被一般朝鮮的知識分子廣泛利用，不能不說殊為可惜。

第二、《集成》傳入朝鮮之後，無意中成為朝鮮接受西學的一個途徑。這個問題，我們可分兩個方面來論述之。首先，丁若鏞在築造華城時，參考《集成》所載的《奇器圖說》的內容而製造「起重架」，藉此節省人力和物力，而得到正祖的賞賜。有趣的是，丁若鏞似乎不知道《奇器圖說》是耶穌會傳教士鄧玉函（J. Terrens, 1576-1630）的著作。那是因為丁氏認為《集成·奇器圖說》、朴齊家的《北學議》和朴趾源的《熱河日記》所載的都是「中國器用之制」，並無說明《奇器圖說》是外國人所作的事實。⁷³其實，丁若鏞是否知道《奇器圖說》的作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丁若鏞確實利用西學來把自己的經世致用思想付諸實現。這意味著《集成》所載《奇器圖說》已成為丁若鏞以及朝鮮朝廷接受西學的一個媒介物。

其次，正祖年間所制作的地圖亦存在著西學的痕跡。眾所周知，《集成》收錄的地圖，一般認為是取自於《皇輿全覽圖》⁷⁴。《皇輿全覽圖》

⁷² 〈利用監〉，〈冬官刑曹〉，《經世遺表》卷二，《丁茶山全書·政法集》，頁36。

⁷³ 同上註，丁若鏞中云：「臣於先朝，校書奎瀛府內下《圖書集成·考工典》第二百四十九卷，即奇器圖說彙編者也。其後又見奎章閣檢書官朴齊家所著《北學議》六卷，其後又見故儒朴趾源所著《熱河日記》二十卷，其載中國器用之制，多非人意之所能測。」

⁷⁴ 但需要注意的是，《集成》所載地圖，「要簡略的多，並刪除了經緯座標線，可見當時的學者尚未意識到經緯線在地圖測繪中的重要性。」見於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制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雖然是中國地圖，而實際上是由耶穌會傳教士依據西洋的地理知識而製作的。那麼朝鮮學界在無意中，利用《集成》所載的耶穌會傳教士所測繪的地圖，來擴展他們的中國以及滿州地區的認識，這無疑是《集成》使得西學傳播朝鮮之明證。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集成》所載的其他內容，亦成為朝鮮學者理解西洋的媒介。《集成》所載《奇器圖說》不僅給丁若鏞製造起重架提供力學原理，而且介紹西方的文字系統——即英文字母。李奎景通過徐有 收藏《奇器圖》刪節本，第一次接觸英文字母。鄧玉函在《奇器圖說》中，利用英文字母來說明機械的驅動原理，李奎景在《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中介紹「《奇器圖說》載二十三字， $\lambda\epsilon\iota\omicron\upsilon\alpha\zeta\kappa\pi\tau\eta\upsilon\phi\gamma\iota\mu\eta\nu\sigma\chi\acute{\eta}$ 」⁷⁵，同時認為西方傳教士學習中國經傳跟中國學者解破英文字母旨在「書同文車同軌之大義」。⁷⁶

總之，《集成》可說是朝鮮接受西學的一個中介者，這種結果是《集成》的編纂者、朝鮮國王正祖以及利用它的一些朝鮮學者始料未及的，這正是書籍交流帶來的正面意義。

頁270。

⁷⁵ 〈西洋通中國辨證說〉云：「按鄧玉函、王徵奇《奇器圖說》載廿三字， $\lambda\epsilon\iota\omicron\upsilon\alpha\zeta\kappa\pi\tau\eta\upsilon\phi\gamma\iota\mu\eta\nu\sigma\chi\acute{\eta}$ 丫額衣阿午則者格百德日物弗額勒麥擲色石黑。其說曰，《奇器圖說》，一紀號必用西字，號初似難記。正因其難記，欲覽者，怪而尋索，必求其得耳。況號止二十形象各異，又不甚煩不甚難乎。今將西字總列于左，即以中字 列釋之，以便觀覽。且欲知西字，止二十號耳，字母字父二十五字，可括萬音萬字耳。西字二十，但記其形；中字二十，但記其音而已也。《奇器圖》原本六冊。徐尚書有矩收藏《奇器圖》刪節一本，載《圖書集成·考工典彙考》中。」《五洲衍文長箋散稿》，頁357。

⁷⁶ 同前註，李氏云：「東西雖通，其文字言語，必難相通。而東來修士，明習中國經傳，類如宿契。中原亦解破二十三字，輾轉成文，旨哉！書同文車同軌之大義也。」頁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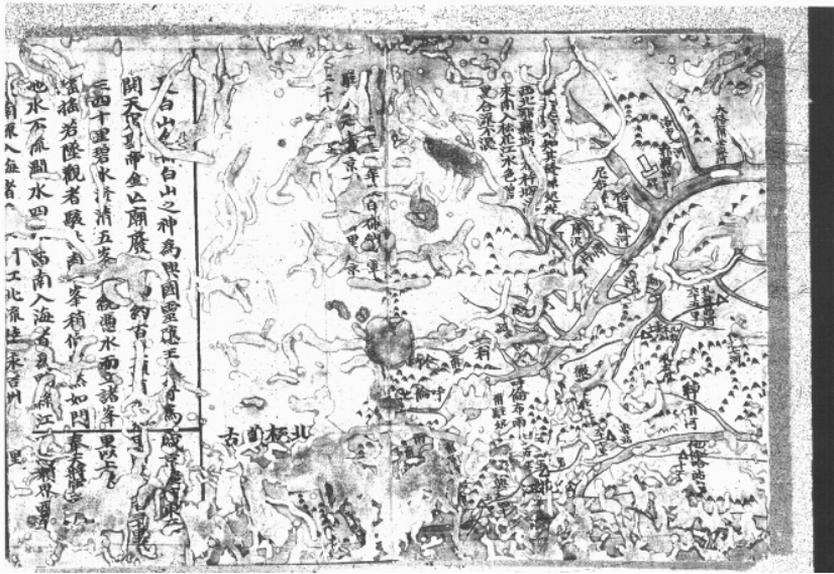
五、結論

據以上的論述，本文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朝鮮在1776年《集成》傳入朝鮮之後，大約至1782年為止，為了妥善保管以及利用它，做一些工作，如重新裝潢、編《圖書集成分編第次目錄》等。之後，《集成》一直藏於奎章閣，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

第二、《集成》傳入朝鮮之後，雖然一直藏於奎章閣，加上只有少數人閱覽它，但是對於朝廷政策的策劃與執行方面，往往提供參考資料與理論的依據，藉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築造華城、編纂《武藝圖普通志》、製作地圖、朝廷典禮等方面均有影響。除此之外，朝鮮學者還在考證、輯佚等方面利用《集成》的相關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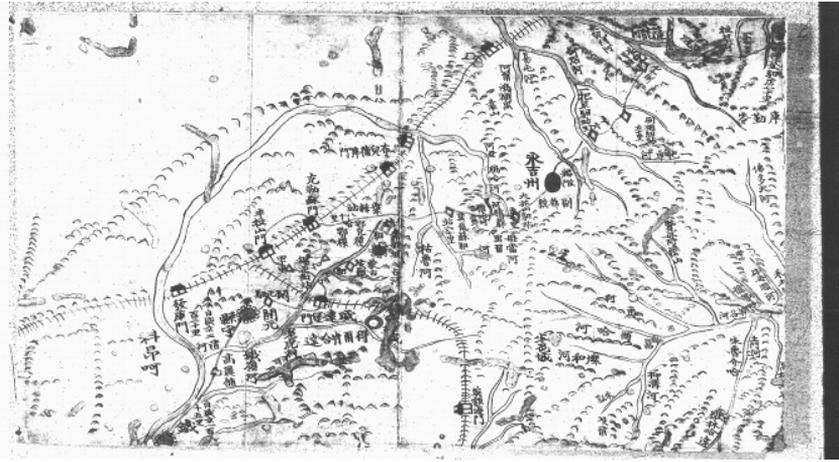
第三、《集成》傳入朝鮮具有深一層的文化意義。首先，正祖積極購買中國書籍意味著18世紀朝鮮對清朝文化的肯定，《集成》傳入朝鮮又具有代表性的。《集成》傳入朝鮮的時期，正是朝鮮積極引進清朝文化的開端，象徵著正祖年間朝、清兩國文化活潑交流的開始。其次，《集成》傳入朝鮮之後，無意中成為朝鮮接受西學的一個途徑。這是《集成》的編纂者、朝鮮國王正祖以及利用它的一些朝鮮學者始料未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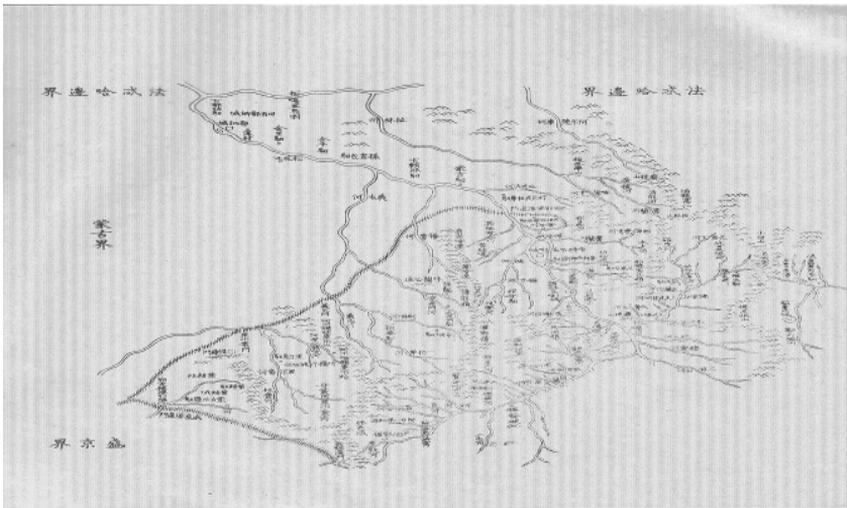
圖五：《西北界圖》第六冊，現韓國奎章閣所藏



圖六：《西北界圖》第六冊，現韓國奎章閣所藏



圖七：《西北界圖》第四冊，圖的中央下面之右方為「英額邊門」



圖八：《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烏喇寧古塔部·烏喇疆域圖》

圖左下方底為「英額邊門」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Gujintushujicheng* in Chosun Dynasty

Ho Kim*

Abstract

Now one of the Yongzheng tonghuozi first addition *Gujintushujicheng* is preserved in the Kyujanggak. This *Gujintushujicheng* is imported from Qing Dynasty to Chosun Dynasty in 1776 by the order of king Jeongjo, The Twenty-second king of the Chosun Dynasty. In according to a related document, this *Gujintushujicheng* had a huge impact on society of Chosun Dynasty at that time. But unfortunately the *Gujintushujicheng* that has been preserved in the Kyujanggak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majority researche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launch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spreading process and influence of *Gujintushujicheng* in Chosun Dynasty. Finally, this paper is to search for cultural meaning from two points of view that Korea-China book exchange and western learning spread in Chosun Dynasty.

Keywords: *Gujintushujicheng*, Kyujanggak, Korea-China book exchange, spread, influence, cultural mean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gKyul University